

走近大思想家



(英) 肖恩·霍默 著  
Sean Homer  
孙斌 宗成河 孙大鹏 译



FREDRICK  
JAMESON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

上海人民出版社

*FREDRICK*  
JAMESON

#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

走 近 大 思 想 家

(英)肖恩·霍默 著  
Sean Homer  
孙斌 宗成河 孙大鹏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英)霍默(Homer, S.)著;孙斌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走近大思想家)

书名原文: Fredric Jameson: Marxism Hermeneutics Postmodernism

ISBN 7-208-04984-X

I. 弗... II. ①霍...②孙... III. 詹姆森, W. (1842~1910)-  
哲学思想 IV. B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25556号

责任编辑 顾兆敏

特约编辑 李卫

封面装帧 陈楠

走近大思想家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

(英)肖恩·霍默 著

孙斌 宗成河 孙大鹏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插页 4 字数 194,000

2004年7月第1版 200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100

ISBN 7-208-04984-X/K·1037

定价 20.00元

# 目 录

导言 .....	1
萨特：从情境到历史 .....	8
第一章 形式的辩证法 .....	16
形式的逻辑 .....	17
内容的逻辑 .....	32
元评论 .....	37
第二章 历史：政治无意识 .....	45
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主义 .....	49
作为政治无意识的历史 .....	53
作为叙事的历史 .....	69
历史作为谁的叙事？ .....	76
第三章 欲望政治学 .....	91
快感的意识形态 .....	92
欲望的意识形态 .....	95
欲望的生产 .....	99
对力比多机制的表述 .....	112
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辩证法 .....	120

第四章 后现代主义和后期资本主义 .....	128
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	132
后期资本主义的分期 .....	138
视频艺术和后现代文本 .....	144
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	152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辩证法 .....	160
第五章 后期资本主义的空间逻辑 .....	165
社会理论中对空间的重新维护 .....	166
后现代主义的现象学 .....	168
社会性的空间生产 .....	179
空间的符号学 .....	182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时空辩证法 .....	186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和差异政治 .....	195
总体性的后现代批判 .....	196
马克思主义和总体性 .....	198
中介和物化 .....	211
“第三世界”:同一和差异 .....	216
结论 .....	223
马克思主义和 / 或后现代主义? .....	225
中介和文化政治 .....	234
索引 .....	244
译后记 .....	266

# 导 言

1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被称为“可能是当今用英语写作的最重要的文化批评家”<sup>①</sup>，他被公认为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著称的那个批判理论传统的最前卫的辩护者。早期，通过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中对法兰克福学派和黑格尔辩证批评传统的批判性考察，以及在《语言的牢笼》（1972）中对结构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的批判性考察，詹姆森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复兴中所作的贡献可能比任何人都多。这两本书代表着大陆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北美学术界传播的主要文本，那里当时对这些传统还比较陌生。这些著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建而言也处于核心的地位，此重建乃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文化理论发展为最具挑战性和最激进的当代批判实践的思潮之一，这一思潮竞争于诸大学之中。随着《政治无意识》（1981）的出版，以及首先与后结构主义和阿尔都塞派的马克思主义展开的持续交锋，詹姆森作为一个具有自己头衔的主要理论家出现了。《政治无意识》使他成为那个国际理论家小团体中的一员，此小团体的工作决定了当代理论论争的参数。由于80年代早期他关于后现代性的那些富于启发性的文章的出版，詹姆森作为至今仍在工作的最重要理论家之一的声誉大大提高了，而《后现代主义，或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91）这一纪念碑式的论著则使之达到了顶点。他对后现代性及其文化逻辑

的时空动力学——这个被理论和文本所渗透的课题——的分析 2  
提供了一些最具影响也最具争议的见解。詹姆森 90 年代关于全球化和地缘政治美学的作品试图描绘资本主义普遍化逻辑的文化和政治含义，这只是巩固了他作为一个独一无二和肆意而为的批判家的地位。

在美国，詹姆森是当代理论和文化论争的一个核心人物，他的作品为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同样也为非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点。但是在欧洲他得到的注意相对较少，人们看不到，比如说，十分踊跃的读者或者介绍和阐述性的文本，就像在德里达、鲍德里亚、福柯和大多数其他主要大陆理论家那里所能看到的那样。<sup>②</sup>我们对此能做何解释呢？他无疑是一位难读的理论家，在本书中我并没有试图躲避和搪塞这些困难，但是他真的比德里达或者拉康更困难一些吗？现在的学术界中理论无处不在，对于困难的语言和模糊的文风所表达的复杂、有时是稀奇古怪的观念，大多数的研究者即使不是应付自如至少也习以为常了。但是，要将詹姆森列入许多大学生的课程看起来仍然十分困难，尽管那些承认读不懂《政治无意识》第一章的学生一周之后便能自如地引用《关于语法学》或者接下来的《文本》(Ecrits)。

因此，这里有一个更深一层的逻辑在起作用，它一方面包括詹姆森自己话语的历史特殊性，另一方面包括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政治命运。詹姆森一直主张保持历史概念的重要性，而且首先是我们自己政治和理论实践的历史性意义。有点讽刺意味的是，他自己的工作却时常被批评为太拘囿于历史和文化了。詹姆森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他对个别哲学困境如物化和主客体分裂的重视，以及对总体性和阶级统一特性的强调，时常都是从一个欧洲人的视角来观察的，但却又有尤其是北美人的成见。

因此,他对资本主义普遍化的过度关注,以及他对思考或描绘世界经济体系的总体的过度关注,都不能同他作为这个国家——正在追求世界霸权的美国——的理论家的地位相分开。

我会回到这些批评的,这牵涉到历史和叙事,牵涉到后现代主义和空间理论,最后还牵涉到当代文化政治学给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问题。然而首先值得提起的是,为了异质和差异的概念而拒绝总体化理论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如斯拉沃·西泽克已经提醒我们的那样。<sup>⑤</sup>后结构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者比如詹姆森的批判,其论据就是断言马克思主义描述了一个过于总体化的理论,因此削弱了差异和特殊而走向同一和均质。很明显这种批评对于多数还原论和决定论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是有道理的。然而,资本主义无疑是一个普遍化的体系,它日益构建着我们主体经验的每个方面,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自80年代末苏联解体以来,资本主义明显地又掀起了一轮新的全球性扩展和标准化的浪潮。因而从后结构主义差异和异质的视角来拒绝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化叙事,在反思上就显得鲁莽了。

这并不是说詹姆森的工作在这方面就没有问题,我在本书中所做的各种各样的批评将表明这一点。但是,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系统 and 结构特征,如它的游牧的、异质的、精神分裂的逻辑,在今天仍保有基本的重要性,那么这还是可以接受的。詹姆森观察全球资本主义的视角当然有其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但是,他是一个谋求全球政治和文化霸权的头号国家中的文化理论家,正是这种历史地位的独特性使他能够去反对大多数当代主流理论。詹姆森试图追寻遗留下来的对不可表达的社会总体性的表述,也就是辩证地思考资本主义结构的和框架的、系统的和物化的性质,这无论从今天的欧洲大陆还是联合王国的视角



看来的确都是令人震惊和不可思议的。但它对于当代政治、文化和社会理论的意义和挑战正在于此。

我们现在知道,在这些当代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中,只要哪种理论诉诸经济和阶级决定,就会被先天地当作是本质论的、还原论的、意识形态上要破产的。<sup>④</sup>但有点反常的是,每次当政治右派公开承认经济在社会和政治事务中的首要地位时——从 80 年代的美国和英国到 90 年代的俄国和韩国——,大部分激进的和“文化的”左派就会完全放弃这块传统的批判领域。与后现代主义者们的某些过于自大的宣称比如像自由漂浮象征、新技术革命和超现实概念等等相反,经济在今天的社会关系中将会表现出比我们以往历史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决定性。因此,詹姆森所给我们的教诲,在关于政治、文化和经济之间关系的某些基本问题上,将比我们愿意接受的更合时宜。

这也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左派可以简单地把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撇开,宣称它自己对历史和社会的分析像公理一样正确。许多从性、种族、性征、生态和其他所谓“边缘”政治构造的视角出发对正统左派所进行的批评,在本质上仍然是有效的。然而,问题在于,这是否从根本上排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学。本书的出发点是认为詹姆森的工作对促成一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实践起了重要作用,这一批判实践既要容纳和回应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众多批评,同时又要保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分析范畴。换言之,当前马克思主义者或激进左派的政治律令,既不是像后马克思主义者们要我们做的那样割裂文化和经济的关系,也不是转而像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那样乏味地再次宣称经济决定的首要地位,其任务乃是发展一种足够灵活的理论,以说明以下两个方面之间日益复杂的中介:一方面是全球的经济市场,另一方面是我们离散、

零碎的文化经验。詹姆森以挑衅和好斗的姿态向人们表明，这样一种话语不仅是可取的，也是可行的。

詹姆森在欧洲相对缺乏批判性注意的第二个方面是由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命运所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和关于其问题的作品自70年代初以来在美国经历了一场意义重大的复兴，而欧洲大陆，用詹姆森的术语来说，其同一时期的政治文化理论却在不懈地“非马克思主义化”(demarxification)。自70年代中期以来，马克思主义被一系列可供选择的理论话语替代了，比如结构主义、解构、精神分析和后现代主义等。就像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活动的统治中心从日耳曼和拉丁欧洲转移到英语国家的这种地理上的变更，并不能简单地被解释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败在了更加优异的替代者手中”。<sup>⑤</sup>的确，对马克思主义和大陆哲学的相遇所进行的切近详细的考察表明，“自称对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一种真正的挑战”<sup>⑥</sup>是肤浅和无用的。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欧洲激进和批判理论中的衰落不能从它的内部来解释，根据观念史的思想，这必须从整个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来看。70年代欧洲共产主义、毛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都以它们各自不同的方式经历了政治挫折或低潮，这证明它们不能满足被1968年学生抗议和新出现的社会运动所激化的一代人的要求。这些挫折或低潮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治战略的问题，欧洲马克思主义对此未能作出足够的回应。詹姆森的方案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中发展的，此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并非是处于支配地位的概念范式或政治范式，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方案就有其启发性。詹姆森反思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的可能性，以及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同情的对话的必要性，这些反思事实上更适合于90年代而不是70年代的读者，因为在

70年代,一个更为自信和强大的左派仍然控制着理论的舞台。

就像下面我要讨论的那样,詹姆森一直坚持一种开放的、多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话语。他主张,与其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自我一贯的、内部一致的立场,不如说其作用是使其他思想形式得以纠正,使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理论得以非理想化(de-idealization)。这样,詹姆森就能在保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的同时,利用和吸收其他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洞见。詹姆森卓有成效地把许多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归于局部和偶然的有效性,从而暴露出他们立场上的局限和历史性局限。简而言之,詹姆森严格而又雄辩地寻求一种精致的、非还原主义的、非机械论的马克思主义形式,以适应为当代社会和文化提供理解和批判的要求,适应回应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的要求,最后,适应重新肯定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解放叙事的要求。我要考察的就是詹姆森达到这个目标的程度。

我已经说明詹姆森是一个难读的理论家,这部分是由于他的文风以及对辩证思想传统的一种特殊坚持,对于许多在后现代文本玩笑的、零碎的、格言式的文风中成长起来的学生来说,这种传统是陌生的。詹姆森是一个问心无愧的体系思想家,他不断地努力在自己的文本中表演或包容辩证运动。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他已经创造了一个在哲学的广泛度、政治的完整性、理智的严密性上都达到惊人程度的作品整体。萨特、卢卡奇和阿多诺是他在哲学-文学上的(philosophical-literary)伟大模范,但他同时也坐在家中同拉康、德里达和鲍德里亚这些人物交锋。而且,他提供了一个惊人的文化分析范围,从“高雅”文学到科幻小说,从流行音乐、电影和录像到绘画、雕塑和建筑。詹姆森会毫不费力地从讨论海德格尔转到流行音乐和好莱坞电影,那种自如令人顿时瞠目结舌。他将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对抗的理

论家和观念结合进了他的作品，这对大量自负的假定和预设的观念形成了挑战，这些假定和观念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及其在当今社会文化批判方面所受到的怀疑。詹姆森的作品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文化政治学领域中仍具有重要意义，提供了一种最牢靠和最明确的论证。他的成就再一次提醒我们，关于“马克思主义之死”的预言大多是不怎么成熟的。

本书的目的有三个。首先，它要尽可能详尽地介绍作为批判家和理论家的詹姆森的作品。其次，联系哲学传统来给詹姆森的理论和政治方案定位，他的作品是从这个传统中产生的，而他也是在其中继续行进和发展的。为此我研究了萨特、黑格尔、阿多诺、卢卡奇、阿尔都塞、拉康、德勒兹、鲍德里亚、曼德尔和列斐伏尔这些影响重大的人物，主要是针对詹姆森对他们作品的特殊兴趣，以及他如何把如此众多不同的理论家包容于他自己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同时，我试图在历史中为詹姆森自己的文本定位。最后，本书也是为了推进对詹姆森作品的批判。我的工作集中在六个关键的领域：形式的问题；历史的描述；快感和欲望政治学；作为后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的全球化和空间理论；最后是他的社会总体性概念。在每一个领域我都是先界定问题，分析詹姆森本人的介入，然后得出他辩证和兼容进程中所蕴含的理论和政治意义。

詹姆森坚持认为，确切地说，我相信他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概念有历史、阶级斗争、商品拜物教、物化、乌托邦主义或变革政治学以及后期资本主义的总体化性质等等，我相信这一点他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不会由于后结构主义的批判和解构的批判而无效，后现代主义也未能使它的历史和解放叙事失去信誉。另一方面，剧烈变化的政治和理论环境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必须重新思考它的基本教

义。詹姆森的作品在这样的方案中处于核心的位置，我的许多批评，其力量也来自于他将通常是对立的理论立场包容和消解在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框架中的尝试。詹姆森的作品起到了一种示范的作用，这乃是由于它的整合性，由于它承诺造就一个激进、多元、非独断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实践和政治学，以适应 20 世纪最后几年中的发达资本主义。

## 萨特：从情境到历史

詹姆森政治经验形成的标志是两个相互关联的事件，这就是麦卡锡主义的余波和新左派的兴起。他早期政治和哲学发展中的关键人物是法国存在主义者让-保罗·萨特。詹姆森的处女作《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1961），本是 50 年代后期他的博士论文，那时新批评主义仍主宰着美国。<sup>①</sup>对这种保守霸权的主要反抗之一是乔治·泼雷特和 J. 希利斯·米勒的受现象学启发的批评，而我们现在称之为“理论”的第一批作品，特别是早期罗兰·巴特和阿多诺的书，当时只是慢慢地为人所知，尚未对知识界产生强烈影响。因此，詹姆森自己的存在主义现象学研究成为了某种更宽泛打算中的一部分，此打算乃是要在学术界彻底破除保守的新批评主义的批判范式。对萨特的研究，而不是对胡塞尔或梅洛-庞蒂的更为纯粹的现象学研究，在某一方面是有重大意义的。就像弗兰克·伦特里希亚所评论的那样，那时萨特对美国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小，对于受现象学启发的文学批评来说他并不是一个当然的选择。<sup>②</sup>而且，萨特在 50 年代后期才作为最激进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家出现。因此，之所以选择萨特，其政治意图要比初读《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所传达的更为强烈。

萨特在詹姆森理论和政治的发展中具有久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关于萨特和历史的那一章是该书对单个理论家扩展最广的分析。《政治无意识》中对康拉德《吉姆老爷》的分析,或者《后现代主义,或后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对总体化概念的维护,证明了萨特的持续影响。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萨特的概念框架启发了詹姆森大量的自己理论陈述。比如,菲利浦·伍德已经注意到詹姆森《政治无意识》中“三个共轴解释视域”的概念与萨特“意义的等级制”的概念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sup>⑧</sup>詹姆森坚持把历史和政治的解释当作是“所有阅读和解释的绝对视域”,这也不只是萨特的《寻找方法》的一种简单重复。<sup>⑨</sup>另外,詹姆森持续地对生活经验进行分析,并给予诸如认知的测绘(cognitive mapping)这样的概念中的意识以核心地位,这背叛了他思想中对经典存在主义的中心论题的坚持。

然而,还存在着更深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萨特的理论深深地嵌入了詹姆森的文本和政治方案,这乃是通过他与存在主义交锋中所首次遭遇的问题。如詹姆森自己所说,“向‘萨特主义’的‘转变’本身始终非常不同于更为传统的美学或哲学类型的现代主义转变”。<sup>⑩</sup>与康德主义、海德格尔主义,或者更近的德里达的解构不同,对萨特主义的接受“与其说是同意萨特本人的立场,倒不如说是一种一般性的考问”。<sup>⑪</sup>詹姆森对自己的存在主义时期以及此时期与他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解之间的关系作了个人解释,他把萨特刻画为参政知识分子的范型:“对于整整一代法国知识分子,还有其他的欧洲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英国左派,也包括像我这样的美国人,萨特代表了政治知识分子的典范,他是为数不多的角色模式之一,但却是货真价实的一个。”<sup>⑫</sup>

如道格拉斯·科尔纳所说,萨特是詹姆森的“初始选择”,也就是说,他的最初姿态和先入之见,用存在主义的术语来说,那

是引发一个人的“筹划”的东西。科尔纳继续评论道，50年代萨特在美国被看作是“激进的个人主义知识分子”和“所有习俗的反叛者”的典型人物。<sup>⑨</sup>在把萨特采纳为范型的同时，詹姆森也表达了自己激进的、不俯首听命的渴望，尽管这个被采纳的范型至死都忠诚于个人主义。萨特可能比任何其他左派人物都更能象征参与型知识分子(*intellectuel engagé*)，他们追求政治干预，但又不同于任何群众的政治组织和传统的政党结构。萨特寻求一种可行的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它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关涉到当代的法国，但又与共产党和苏联的教条主义相决裂，这在詹姆森《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那里得到了强烈的共鸣。对于詹姆森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应用于事件既定状态的僵死体系，而是一种情境中的话语，一种开放的、可变的、随着具体历史环境发展的思想整体。詹姆森写道，一以贯之的便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根据思想反映具体的社会情境这个法则——今天的世界应该有许多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并各自回答它自身社会—经济体系的特殊需要和问题。”(MF, x viii)因此，与萨特一样，詹姆森的任务乃是发展一种可行的马克思主义形式，以适合当代北美社会的需要以及“西方垄断资本主义所特有的问题”(p. x viii)。

正如题目所表明的那样，关于萨特的这本书涉及一位作家特定风格的发展。但即使在这本早期的书中，詹姆森的“风格”概念也不是个人主义或者纯美学的，而是作为一个历史现象被加以思考。对于詹姆森来说，风格并非是一个简单的个人表达的问题，也不是纯粹的文学效果，在其现代意义上，一种特定的风格所承载的意义超越了文本和个别语句自身的意义。作为读者，我们对一种独特风格的感觉是累积而成的，是片断、词汇、短语、句子、著作的逐渐集合，它们综合起来给人以一种印象，即一

种独特的风格乃是一个连贯的实体，而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表达它的全部效果。这种对风格的特别关注，本身是一种现代的现象，从中我们可以预期新的写作风格和旧的文学形式之间的彻底断裂。另一方面，也存在这样的历史阶段，其间，詹姆森在《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中所说的“继承下来的形式与不由自主地在其中填进更多现代内容的风格”，在同一个作品中得以共存。这样的历史阶段，詹姆森说，“并非表明作者的低能，而是反映了他处境中一个新问题的历史阶段，反映了写作本身的发展史中的危机阶段”（SOS, vii）。萨特的文学成就正是在于阐述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

10

詹姆森对萨特风格的切近读解已经具备了今天我们今天对詹姆森式的分析所期待的一切东西：对形式和内容的注意，敏锐的哲学理解和詹姆森自己的优美叙述。其作为整体的分析和研究中所缺乏的东西，乃是将文本分析嵌入它们自身历史阶段的尝试。对于一种奠基在意识和行动的历史处境之上的哲学来说，詹姆森分析的非历史性着实让人吃惊，这也正是其自相矛盾之处。这种可叙述性危机(crisis of narratability)的可能条件没有得到历史地说明，并不能简单地归于詹姆森自己的方法论的失败，毋宁说它划出了存在主义本身的界限之一。通过回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个人传记并不只是萨特喜欢的形式，而且也是萨特式体系本身的最终界限，<sup>⑤</sup>同时，恰是这个界限以其对意识和事物之间关系的普遍中介而限定了詹姆森自己的研究视域。萨特的研究从未再迈出下一步，以便把这些哲学的关注置于它们的社会和历史语境之中。就像詹姆森所看到的那样，萨特的大多数作品恰好在这样的地方停住了：“个体生命的问题不能再独立于它生活的社会，而是突然服从于社会和历史的变革”（SOS, 7）。在萨特关于如何开始阐述个体经验、历史、社会变革之间复



杂关系或中介的作品中,詹姆森首次遇到了理论界限,此界限勾勒出了詹姆森后来的大多数作品中的问题——换句话说,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体系中,我们如何能够开始把孤立的文化制品同宽广的历史力量和个体能动作用相联系,并使之理论化。

《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还有比这个循环更多的意义,正如詹姆森自己所承认的那样;萨特的存在主义和现象学既提供了研究的对象,也提供了研究的方法论。詹姆森在他的分析中所采用的范畴也是萨特详尽阐述其自身哲学时所使用的范畴:“瞬间”、“行动”、“事件”、“看”、“情境”等等。因而詹姆森把萨特的戏剧读解为萨特主客体之间基本对立在形式上的体现。自相矛盾的是,一方面,詹姆森的立场在于极力维护哲学文本和文学戏剧文本之间的区分,他坚持萨特的戏剧只能被认为是“观念剧”(idea-plays),前提是如果我们接受“这位哲学家戏剧中的‘观念’实质上与其哲学作品中所发挥的思想完全不同”(SOS,3)。另一方面,詹姆森为了使其解释有效,似乎不加疑问地从小说作品转换到哲学作品,很少注意两者所牵涉到的观念在质上的区别。事实上,这一点如果再加上由于全面维护语言而给其他形式的考察所造成的损害,<sup>⑥</sup>就会使人强烈地感觉到,阿多诺批评萨特的作品只是“论文戏剧”或“哲学小说”是有强大基础的。<sup>⑦</sup>类似地,我们发现詹姆森对《缓刑》(*Le Sursis*)中的时间的分析“对于萨特哲学作品的读者来说”将是“很熟悉的”,这种分析在那里“不以为耻,毫不掩饰”(SOS,61)。在本书看来,这里存在着一种明显的自我指涉,因为尽管詹姆森活动于萨特的文学作品和哲学作品之间,但他从未走出过萨特的语料库。科尔纳认为,詹姆森的文本中缺少对其他批评家的引证,是基于现象学对事情本身的要求,这种要求远离其他的方法论进路,不带成见地达到研究的对象。<sup>⑧</sup>《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表现出来的方法论两